

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

彭光谦 著

中国

ZHONG GUO JUN SHI ZHAN LUE WEN TI YAN JIU



军事战略问题 研究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

中国

ZHONG GUO JUN SHI ZHAN LUE WEN TIYAN JIU



军事战略问题
研究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彭光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军事战略问题研究/彭光谦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6

ISBN 7-5065-5118-7

I. 中… II. 彭… III. 军事战略—中国—现代—文集 IV. E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5100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印张: 11.875

字数: 330 千 印数: 5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军事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后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产生的邓小平军事理论，更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在这一历史时期，军事科学的学科化、正规化建设，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学科化是军事学术分类、系统、继承、发展、交流的前提条件之一。中国军事科学在这个历史期间确定了八个一级学科、十九个二级学科的学科体系。这为军事科学研究、教育创造了极好的发展途径，也为中国军事科学界与世界各国的军事科学界的学术衔接、沟通、交流提供了方便。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军事科学的研究者。他们是新中国军事科学学科化的开拓者与代表人物。他们长年累月在某一学科领域的探索 and 追求，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有影响力的文章，构成了当代中国军事科学中最亮丽、最鲜艳、最值得展现在历史花坛上的风景。因为这些成果不仅仅是属于他们个人的，而且是属于整个中国军事科学界的。将这些代表新中国军事科学学术发展的“扛鼎之作”、“经典之作”结集出版，是中国军事科学界建筑“学术纪念碑”式的工程，对当代及后代将大有裨益。为此我社出版了《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

这套丛书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代表性。即选择当代中国军事学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选取他们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结集出版。二是开放性。即丛书不是一并出齐，而是根据情况陆续选择作者，接连不断地出版，最终构成新中国军事学的“宏篇巨著”。

祈盼军事学界的同仁能鼎力相助，多提意见，帮助我们出好此丛书。也希望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序：以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进行战略理论思考

军事领域是一个充满风险性、对抗性、暴烈性、不确定性以及血与火的领域，它比其他任何领域更加迫切地需要自觉的理论指导。军事领域的较量不只是物质力量的较量，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不只是技术装备的对抗，也是意志、谋略与智慧的对抗。军事领域从来不同情与怜悯弱者。相反，军事领域一条不变的法则是落后必挨打，弱肉遭强食。所谓落后挨打不仅仅是指技术装备上的落后，而且是军事思想、军事理论上的落后。在某种意义上讲军事理论上的落后是内伤，更加具有顽固性、隐蔽性与致命性。在世界军事史上因技术落后而遭致挨打的教训不胜枚举，因军事理论落后而遭致败亡的教训也比比皆是。有时候这两方面的落后几乎是同时存在的。法国历史上本来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产生过像拿破仑这样的杰出军事家。但当机器大工

书，其中有几十种是介绍当时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著作，这本来是了解西方军事思想的极好机会，但清政府却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十一月初七），全部送理藩院中封存，交给耗子去批判了事。直到 80 年代，洋务派首领两广总督张之洞还坚持认为“将帅之智略，战士之武勇，堂堂中国自有干城腹心，岂能学步他人，别求新法？”对于西方军事思想“断宜弃之不学”。（《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 11）鸦片战争之初，英军常备军仅 14 万人，派到中国来的不过 2 万人，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有 4000 人，而清政府有八旗军 20 余万，绿营军 60 余万，加上地方武装共计百万之众。侵华英军虽然“船坚炮利”，占有质量优势，但英军劳师远征，异国作战，有诸多不利因素。如果当时清政府能有效地组织全体军民奋起抵抗，如果清军能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灵活主动作战，而不是死抱住祖先入关“马上打天下”的传统不放，不是只会摆布兵勇密集的方阵队形，不是只会一线正面设防，株守炮台，不是只会遍收马桶，置于阵前，乞灵于以邪制邪的“马桶战术”，那么战争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至少不会败得那样快、那样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之败不只是败在政治的腐败和技术的落后上，也败在军事思想军事理论的落后上。这段国耻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再深思。

今天，与世界战略格局由两极向多极的转变以及人类技术社会形态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相伴随，世界军事领域也正在经历一场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化。与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历次重大军事变革不同的是，这次军事变革不只是某项新技术单一发展的结果，而是以信息技术为内核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群综合发展引起的；它不只是同一个时代下军事的局部进步，而是以人类技术社会形态转型为背景，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动力，以信息化建设和“系统集成”为手段，把适应打机械化战争的工业时代的军队建设成适应打信息战争的信息化军队的时代性大变革过程；它不只是单纯的技术变革和单向的技术推动，而是以理论牵引为龙头，对工业时代形成的军事技术、军事理论、组织体制和作战方式的全面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当前的这场变革是一个跨世

纪的过程，在它的全部内涵还未完全展现之前就要对它作出全面评价似乎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创新的军事理论是贯穿这场重大的历史变革全过程的灵魂，也是这场变革最终得以完成的主要标志。历史上每次大的军事变革都有它的理论形态。被誉为东方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是对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军事变革的理论总结，代表了冷兵器时代军事理论的最高成就。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与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集中反映了以拿破仑战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革命的理论成果。马汉的“海权论”、杜黑的“空权论”，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论”、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则是机械化战争时代军事革命在理论上系列化表现。如果说军事技术革新是军事革新在物质上的推动力，那么创造性的理论思维则是军事变革在精神上的推动力。仅仅是技术上和体制上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理论上重大突破才具有决定性意义。当前美军正在全力探索信息时代的作战方式与军事理论，以充分发挥信息革命所提供的最新作战手段的全部效能。一旦军事技术上的进步与创新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必将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作战能量，使战争面貌发生历史性的巨变，必将进一步拉大军事先进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战略差距。这对我们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代军事世界建立在一定军事实力基础之上的理论对抗与理论威慑日益突出。在美苏核竞赛中，“相互确保摧毁”理论和“第二次打击”理论就对保持两个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恐怖平衡起了明显作用。在中国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人民战争理论也使所有侵略者把入侵中国视为畏途。如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所说的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是进攻就一定倒大霉，因为中国像一块吸水石一样，任凭你有原子弹，有大量新式的技术装备也无济于事，必将被七亿中国人所击败。当代世界军事领域的理论创新所蕴含的巨大威慑价值将更是迄今人们难以估量的。对当前我们面临的这场深刻的军事变革如果仅仅注意到它的技术方面的挑战，而忽视它的理论方面的挑战是要吃大亏上大当的。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19世纪中叶，在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击国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逼迫下，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日本明治政府在军事近代化过程中，把军事制度、军事思想的改革放在首位，进行了全面的军事改革，建立了近代化的兵役制度，近代化的编制体制，近代化的统率体制，使日军素质有了全面的进步。然而与日本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当时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重心从一开始就落在武器装备的层面上。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声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虽然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先后设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在内的数十家近代兵工厂局，积极引进和仿制西方先进的枪炮制造技术，使清代后期中外火器技术差距由原来大约相差两个世纪缩短到10年左右。以近代蒸汽舰船为主战装备的南北两路海军，其规模与技术水平也一度居东亚之首，但其军事思想与军事制度却没有根本触动，直到甲午战争时，清朝陆军仍采用普法战争时普军队形，海战仍机械抄用特拉法加海战理论。甲午一战，对中日两国两条不同的军事近代化道路作了严肃的裁判。清朝海陆两军在甲午战争中同时覆没的教训说明，仅有技术上的近代化而无思想上的近代化，军事近代化过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没有军事思想近代化，军事技术的进步是不彻底、不巩固的，即使取得有限技术成果也难以发挥其效能。毫无疑问，军事思想理论的变革对于整个军事变革具有无可替代的先导意义。面对当代世界军事领域历史变革的严峻挑战，如果我们不同时从技术与理论上作出反应，特别是首先从理论上进行创新，占领世界军事理论的制高点，我们就会丧失21世纪国际军事斗争中的主动权。弄不好很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闹出鸦片战争中以果勇侯杨芳的“马桶战术”对付西方舰炮的集火射击，海湾战争中以萨达姆的阵前短促出击对付多国部队的“空地一体作战”式的悲剧。

我军已经走过了近80年的战斗历程。在建军作战中，在与国内外一切强敌的较量中我军都打出了威风，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赢得了当之无愧的荣耀。对此，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但是，荣耀只能

说明过去，而更重要是把握现在与迎接未来。世界军事领域的历史性的变革以及战争形态的演化，给我军建设与作战提出了一系列带根本性的新问题。可以说，以往我们的建军作战还没有完全达到工业时代战争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停留在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之间的战争阶段。而我们新时期的建军与作战将是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以至完全的信息时代的战争背景下进行的，与以往相比，在技术水平上跨越了整整一个时代。这种空前的大跨越，对我军原有的军事理论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建国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而和平的环境对一支军队来说是容易产生惰性的。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就落后了多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573页）军事传统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可能是一笔财富，给人以启迪与借鉴，但如果把传统固定化，它就会成为沉重的包袱，导致军事思想窒息与创造力萎缩。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束缚，在当代军事领域新的历史性变革面前，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并不是十分敏锐的。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不仅在军事技术方面有差距，而且在军事理论方面也有逐渐失去原有优势的 danger。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页）邓小平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无疑也包含了军事科学在内。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之所以创造出前无古人的奇迹，就是因为我们首先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抓住了改革发展的主要矛盾，抓住了纲，因而纲举目张，势如破竹。比较而言，我们军事理论研究特别是高技术战争的研究还很不深入、很不系统，有分量的东西还不多。

当前在军事理论创新上，对我们的战略文化传统既有妄自菲薄，捧着金碗要饭吃的问题，也有因循守旧，受困于一些过时的结论与不合时宜思维方式的问题；对于外部世界的思想成果，既有坐井观天盲目排斥的问题，也有食洋不化，照搬照抄只言片语的问题。在千年难

遇的时代大变局面前，在空前激荡的军事世界里，要繁荣中国的军事科学，我们需要的是严肃冷静的思考，需要的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需要的是对国家、民族、人民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我们既要革新传统的陈旧的思维方式，也要继承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经过实践检验的东方优秀战略文化传统；我们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也要区分良莠，不要生吞活剥，更不能把某些西方垃圾当成宝贝，在战略上被人误导。

战略理论工作者没有个人的私利，只有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战略理论工作者，不应有任何的奴颜与媚骨，只应有独立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否则他的一切精神产品都毫无价值可言。

本书选录了作者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的30多篇论文（以写作时间为序），主要集中反映了作者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军事战略基础理论和战略指导问题的思想成果。作者试图从一个中国军事学者的视角，立足于中国大地，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探求新时期中国军事战略问题的因应之道。由于跨越20多年，有的文章不免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这次收录除了某些技术性处理外，均尽可能保持了原样。相信读者会予理解。

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曾经说过：“胜利对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对那些等待变化后才去适应的人。”（《制空权》第2页）恩格斯曾指出：“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45页）我们只有立即行动起来，以更新、更勇敢的头脑，去进行理论思考，才能迎接胜利对我们的召唤与微笑。

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的勇敢的头脑对大变革时代中国军事战略问题的深入思考。

目 录

序：以更新更勇敢的头脑进行战略 理论思考.....	(1)
70 年代美国对中国在其战略结构中 的地位的调整 (1984.3)	(1)
突破传统战略模式，确立新的战略 思维 (1988.10)	(22)
高技术战争中军队体制编制的发展 趋势 (1990.1)	(30)
新时期我国军事战略指导问题 (1990.3)	(34)
国际战略格局演变与区域性军事危机 (1990.10)	(54)
中国核力量与核政策 (1991.2)	(59)
高技术常规战争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 重要形式 (1991.7)	(80)

建国后我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发展变化 (1993.5)	(86)
冷战后的中美安全关系与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 (1995.4)	(105)
台海两岸关系溯源 (1996.8)	(115)
美国与“台独”分裂活动之滥觞 (1996.8)	(123)
从泉台关系看两岸的血肉联系 (1998.4)	(140)
绝对战争向可控性战争的历史性转变 (1998.10)	(145)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军队发展战略 (1999.9)	(157)
战略学基础理论若干问题探讨 (2001.3)	(162)
战略学研究方法 (2001.3)	(194)
把握战略研究的基本走向 (2001.3)	(209)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统一观 (2001.5)	(217)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内涵的新拓展 (2001.11)	(226)
高技术局部战争战略指导问题 (2002.3)	(236)
21 世纪初战略学学科建设与创新 (2002.4)	(249)
关于建立战略评估与战略创新机制问题 (2002.5)	(267)
新版《战略学》的主要创新点 (2002.6)	(272)
两岸共同建设一个中国 (2002.6)	(277)
创新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理论 (2003.4)	(281)
确立新的战争胜负观 (2004.1)	(290)
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2004.3)	(295)
中国国防: 权利与责任 (2004.6)	(303)
中国国防政策的自主性、自卫性与防御性 (2004.6)	(314)
新安全观: 中国国防政策的思想基础 (2004.6)	(322)
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2004.6)	(329)
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台湾问题 (2004.6)	(338)
台海风云与美国军事干涉 (2004.6)	(347)
中国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 (2005.8)	(360)

70年代美国对中国在其战略结构中的地位的调整

七十年代美国在战略上进行了战后最大的一次结构性调整，这次调整是战后美国战略结构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它涉及美国的整个战略布局，重新确立了美国自身力量构成、盟国内部关系和敌我关系。作为这次调整的核心，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打开了中国的关系，结束了中美之间一代人的对抗，把中国从战略敌手的位置放到了“潜在盟友”的位置上，从而从根本上改善了美国的战略态势，实现了军事重心的转移，摆脱了两线作战、腹背受敌的被动处境，扭转了战略失调的严重局面，加强了在欧洲主战场与苏联这个主要敌手抗衡的力量，在世界战略棋盘上取得了进退回

* 本文写于1984年3月，原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都年会论文，发表于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1984年第2期。时任武汉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团副政委。

旋的一定余地。

(一)

战后美国的战略结构一直是建立在所谓“两极世界”的理论之上的。

早在1945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曾经认为“存在着一个分裂的世界”，美国决心对另一个阵营进行“圣战”。1950年初美国秘密制定的战略蓝图“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文件”也提出自19世纪以来，世界力量已有了“根本改变”，“新的因素，是世界力量的极化”，并由此“导致奴隶社会与自由社会的对立”。正是依据这种所谓的“极化”理论，美国战后确立了在全世界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结构。美国的战略构想是：凭借手中的原子弹、美元以及垄断集团中的反共狂热等“三大战略支柱”，推行霸权主义，建立梦想中的美利坚帝国。具体部署是：在美洲，推行新殖民主义，筹建由美国控制的美洲政治、军事集团，建立稳固的战略后方，在欧洲加强对英、法、西德等西欧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渗透，控制西欧，打入东欧，与苏联全面角逐，在亚洲占领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扶植亲美势力，与欧洲战线遥相呼应，对苏构成夹击之势。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美国的战略思想虽然经历了遏制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的演变，美国的军事态势虽然有变化，实力对比有消长，兵力部署也有局部调整，但其战略目标、战略结构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直至60年代末美国一直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基本国策，以苏联作为战略上的主要敌手，以西欧、日本等作为战略棋盘上的小卒，大肆进行冷战，争夺和控制处于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把全世界置于美利坚帝国的统治和支配之下。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大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直接的影响。有迹象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调整其亚洲部署时对中国曾有过短暂的现实考

虑，例如：1949年3月，有50名国会议员要求参院外委会将民主党参议员麦卡伦提出增拨15亿美元援蒋的法案付诸实施未获通过。1949年仲夏，当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示是否需要与毛泽东主席会见时，美国国务院极力主张进行这种历史性接触，司徒雷登的请示几乎为杜鲁门、艾奇逊所批准^①。1949年12月29日，艾奇逊在与军方人员的一次会见中表示，必须承认，共产党事实上控制着中国，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自己崩溃，在中国并无抵抗共产主义的基础。他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眼光要放远一点，“我们除非为了极为重要的战略目的，决不应自己取代苏联来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1950年，对外关系委员会在附属于它的各地讨论对外关系的委员会的成员中进行一次民意测验，结果百分之六十四的受测者都同意美国和中国进行接触，甚至认为“美国采取主动在美国和中国共党政权之间寻求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容忍是可取的”。^②这说明在当时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无论是美国的决策者还是它的谋士们，还没有一下子下决心与新中国全面对抗，究竟置中国于何种位置，尚有过一段的犹豫，按当时流行的艾奇逊的话来说就是“等待埃尘落下”。但是上述考虑转瞬之间便从美国决策者的思维中消逝了，而主导美国战略方向的则是对共产主义的本能仇视，对“丢失中国”的恼怒，以及谋求继续控制亚洲，称霸全球的野心。因此，还未等“埃尘落下”，美国决策者便把中国放到了它的对立面。杜鲁门等，认为毛泽东是“斯大林的追随者”，中国是“俄国的卫星国”，“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黄祸”。在他们看来“同一个民族主义的、人口过多的、贫穷的、共产党管理的中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可能对我们是一种生死存亡的挑战”。^③他们恐惧“中国共产主义”

① WALTER LAFEV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P89.

② 劳伦斯·H·肖普：《帝国智囊团》，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92页。

③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320.